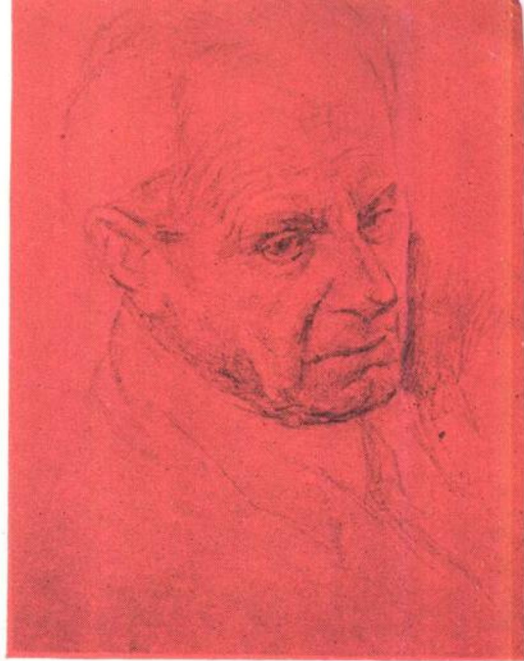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



# 爱欲与文明

——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

EROS AND CIVILIZATION

上海译文出版社

*Herbert Marcus*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Beacon Press, Boston, 1974

根据美国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74年版译出

爱欲与文明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 著

黄勇薛民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625 插页 3 字数 168,000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00册

书号：2188·45 定价：1.95元

## 译者的话

把当代哲学中的某个哲学派别与马克思、特别是早期马克思的思想相融合，试图为治疗今日发达工业社会的弊病提供药方，并为未来社会设计宏伟蓝图，可以说是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重要倾向。在这方面，本书作者，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赫伯特·马尔库塞就是一个突出人物。

马尔库塞生于德国柏林的一个犹太资产阶级家庭。1917年曾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后因对该党叛变革命、实施暴力的行径不满而于1919年退出。随后便到弗莱堡大学，先后受教于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和存在主义创始人海德格尔，并在海德格尔指导下，于1922年写成了博士论文《黑格尔的本体论与历史性理论的基础》，获弗莱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以后，他又从事六年的书籍出版、发行工作。1929年，他重返弗莱堡，进行哲学研究，三年后又因与其老师海德格尔在政治观点上发生分歧而离开了这个城市。这时，他结识了正在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网罗人才的新任所长马克斯·霍克海默尔，并成为该研究所的正式成员。当1933年希特勒执政时，他便亡命瑞士日内瓦，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预先设在该地的办事处供职。次年他移居美国，并于1940年起在美国定居。那时他在法兰克福迁往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研究所主持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所任职，战后任东欧组组长。以后他又重返教坛，先后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1951年)、哈佛大学(1954

年)、勃兰第斯大学(1954—1967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1967年起)。在此期间,他并未自囚于书斋,而是积极干预现实,特别是对六十年代末在西欧、北美出现的那场既不满意资本主义社会,又反对十月革命道路的学生造反运动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他被公认为这场运动的“精神领袖”、“青年造反之父”、“发达工业社会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甚至被与马克思、毛泽东相提并论,与这两者并称为“三M”。<sup>①</sup>1979年7月29日,他在应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之邀赴西德访问和讲学途中,逝世于施塔贝恩克,终年81岁。

马尔库塞毕生致力于把某些哲学思潮与马克思的学说相结合,这种说法是完全符合事实的。然而,他同任何一位大思想家一样,在其一生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如果不说其理论观点,至少其研究重心,也发生过一系列的转折。他先后发表的大量著作就留下了其思想发展的轨迹。在《历史唯物主义现象概要》(1928年)、《论具体的哲学》(1929年)中,他提出了一种被称为海德格尔-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解释成为能实现完整的人而解放必然的新现实的激进行动的理论。这可以说是把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最早尝试。他发表于柏林《社会》杂志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新材料》(1932年),表达了他对当时刚问世的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独特看法,最早提出了有两个马克思,并要求回到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的青年马克思去的观点。他在进入法兰克福学派以后所著的《哲学与批判理论》(1937年)和《享乐主义》(1938年)中主要认为,哲学的重要功能是对存在的批判。这一论点奠定了法兰克福学派著名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他在

<sup>①</sup> 英语中“马克思”、“毛泽东”和“马尔库塞”三个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M,故称“三M”。——编者

《理性与革命》(1941年)中,从黑格尔的哲学立场出发,进一步阐发了这个观点。他认为否定性,即对现实持批判态度是黑格尔哲学区别于实证哲学的基本精神,并试图把这种精神贯彻到马克思的思想中去,或者说试图揭示马克思理论中的黑格尔思想根源,从而提出一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五十年代以后,以《爱欲与文明》为开端所发表的一系列后来被称为青年造反运动教科书的著作则表明,马尔库塞的思想发生了一个新的转折:用弗洛伊德理论补充马克思思想,并以此为武器批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描绘未来文明的蓝图。属于这方面的著作还有:《苏联的马克思主义》(1958年),批判苏联的理论和实践违背了马克思的原来设想;《单面人》(1964年),主要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把既有物质需要又有精神需要的双面的人变成完全受物质欲望支配的单面的人,使具有批判功能的哲学成为与统治阶级利益协调一致的单面的思想;《论解放》(1968年),要求由积极的少数人去教育和拯救必然是被动的多数人,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反革命和起义》(1972年),则是对六十年代末青年的造反运动的总结。

毫无疑问,《爱欲与文明》一书是标志马尔库塞思想发展的一个重大里程碑。这部著作原是作者在1950至1951年间在华盛顿精神病学院的讲稿。该书出版时所用的副标题是“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哲学探讨”,它表明,与一些新弗洛伊德主义者往往乐意自我标榜的作法不同,马尔库塞在此既不想大言不惭地对弗洛伊德理论作某种修改和补充,也不想战战兢兢地为这种理论提供某种更精确、更详尽的解释,用他本人的话说,他只是想对包含于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批判的政治理论和哲学理论作一些引伸和阐发,并与马克思的学说相结合,提出一种批判的文明理论。诚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哲学上,弗洛伊德理论本质上都是保守

的，而不是批判的。但一方面，由于他的理论在实践过程中随着新的证据的发现而不断地得到重建；另一方面，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由于他只是个科学家和医生，而不是一个社会学家、思辨哲学家，因而没有建立一个逻辑上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这样，在其理论中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包含某些相反的、对社会持批判态度的因素。而这正是马尔库塞唯一关心的东西。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把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熔于一炉。下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具体考察一下，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马尔库塞究竟是怎样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学说结合起来的。

第一，他把弗洛伊德的爱欲本质论与马克思的人类解放论相结合，提出了一种爱欲解放论。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结构分为意识和无意识。在他看来，由于受快乐原则支配的无意识是先天形成的，因而更能体现人的本质。无意识中的主要本能是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由于人首先是一种存在，因而人的本质首先就是与存在原则相一致的生命本能。这种生命本能就是爱欲。在现代文明中，人受到压抑，就因为作为他的本质的爱欲受到压抑。因此，马尔库塞指出，当马克思说人的解放时，实际上也就是指爱欲的解放。

但马尔库塞明确指出，爱欲的解放决不能等同于性欲的放纵。虽然弗洛伊德没有明确区分爱欲与性欲，但两者还是有重大区别的。性欲仅仅是关于两性关系的欲望，而爱欲作为生命本能，则蕴含更多的内容，既包括性欲，也包括食欲、休息、消遣等其他生物欲望。性欲对个人来说只能获得局部的、短暂的快乐，而且还常伴之以痛苦和给社会带来混乱。可是，爱欲则会使个人获得一种全面、持久的快乐，并使社会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这是因为爱欲的器官遍及人体的各个部位，爱欲的活动囊括了人类的一切活动。因此，马尔库塞在给弗罗姆的一封信中

断言，弗洛伊德没有把爱欲等同于性欲，而是将性欲看作爱欲向温柔和爱慕的自我升华，因此他并不认为人的解放就是人的性欲的毫无限制的满足。

马尔库塞认为，很明显，解放爱欲的关键就是要解放劳动，换言之，就是要使爱欲进入劳动领域，使人摆脱异化劳动的痛苦，在劳动中获得快乐。这是因为在人的一切活动中，劳动毕竟是最基本的。这一点，弗洛伊德也多少有点意识到了。例如，他认为，工作为力比多构成的各种冲动的释放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但他没有区分异化的工作与非异化的工作。马尔库塞认为，能满足爱欲的只是非异化的工作，是人的各种器官和机能的自由消遣。这种消遣，不象异化劳动那样，只是为了人的自我保存而提供必要的生活资料。相反，它的本性就是满足爱欲，而且除了提供这样的满足，别无他焉。马尔库塞认为，这个思想不仅符合而且补充了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从而认为人的解放就是劳动的解放。然而只有把劳动与爱欲相联系，认识到劳动的解放就是爱欲的解放，才能说明人何以能在劳动中实现自己而获得快乐。

第二，他把弗洛伊德关于在现代文明中爱欲受压抑的观点与马克思关于劳动被异化的观点相结合，发起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总批判。人的本质要求解放，可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它却受到压抑。对此，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晚期以阶级斗争和剩余价值理论为武器所作的批判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了。相比之下，马克思在早期根据异化劳动理论所作的批判倒是击中要害的。因此他呼吁回到早期马克思的思想轨道上去，把批判的重点放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上，但他又认为，由于马克思没有进一步明确地、具体地规定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他的批判也就缺乏可靠的标准。因此，这里还必须用

弗洛伊德的爱欲理论来补充，以便根据人的爱欲是否真正得到了满足，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满足，劳动是否成了、或在多大程度上成了一种作为自在目的的爱欲活动，从而确定人的本性在现代文明中是否受到压抑，或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压抑。

正是根据这一点，马尔库塞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压抑爱欲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尽管表面上性自由泛滥，但由于性关系越来越紧密地依附于社会关系，性自由被用来为统治利益服务，性活动越来越成为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在这种性自由背后对爱欲的压抑更严重了。这种压抑主要表现为劳动的异化。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劳动分工的日益专门化，人们在劳动中从事越来越单调乏味、千篇一律的操作，人越来越成为一种工具。而且，马尔库塞还进一步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压抑着作为人的本质的爱欲，而且还把不属于人的本质的东西强加于人，把人的欲望和需要纳入整个资本主义秩序，使人们陷入深深的异化状态而麻木不仁。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是人类文明迄今达到的顶点，但同时也是爱欲受到压抑的顶点。

第三，他把弗洛伊德对爱欲受压抑的社会根源的分析与马克思对人类苦难的社会根源的分析相结合，论证了解放爱欲、建立一种非压抑性文明的可能性。马尔库塞也承认，非压抑性文明的不可能性是弗洛伊德理论的一个基石。因为弗洛伊德有一个基本假设，即认为文明与爱欲是对立的。人类的文明史，也就是人类的爱欲被压抑的历史。这就是说，爱欲之被压抑有其生物学上的必然性：它本身就具有反社会的性质。因此不是压抑爱欲，便是毁灭文明。非压抑性的文明是不可能建立的。但马尔库塞也注意到，弗洛伊德理论中还包含一些可能与这个基本假设正相对立的成分。例如，他在一定程度上看到，爱欲受压抑



也有其社会历史根源。在 1908 年的《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一文中，弗洛伊德就认为，维多利亚伦理规范使神经症和新的精神病有增无减，特定文明的要求限制了人类的性欲活动。不仅如此，弗洛伊德在一定程度上还看到了非压抑性文明的可能性。因为他认为，在人格最深层的无意识中，保存着以前本能欲望得到完整满足的记忆，而这种记忆将促使人们为重新争取这样的满足状态而斗争。

马尔库塞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首先，马尔库塞认为，性欲有一种内在的约束力、凝聚力，但并不具有反社会性，因而也并不必然与文明相冲突。其次，为了明确区分弗洛伊德所未能明确区分的性欲受压抑的生物根源与社会历史根源，以证明建立一种非压抑性文明的真实可能性，马尔库塞在弗洛伊德的两个基本概念“压抑”与“现实原则”之外，又增加了两个相应的概念：“额外压抑”和“操作原则”。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性欲受现实原则的压抑，这无疑是正确的。但马尔库塞认为，还必须区分作为一般文明要求的现实原则与作为特定文明形式要求的现实原则即操作原则，区分基本压抑与额外压抑。作为一般文明要求的现实原则的根据是缺乏这个基本的事实。由于经济上的贫困和克服这种贫困所需的劳动，要造就文化就必须对性欲作一定限度的限制、克制或延迟。这是一种基本的压抑。它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是合理的。但另一方面，物质资料（不管仍是缺乏的，还是已经丰富的了）分配方式与生产物质资料的劳动组织方式总是强加于人的。它们代表了特定文明阶段的统治利益，因而是操作原则。它们对人的性欲所强行施加的压抑是在一般文明要求的基本压抑之外的、为维持特定统治形式所必需的额外压抑。

马尔库塞认为，在以往几个文明发展的阶段，由于性欲受到

这种双重的压抑，因此文明本身不遭受灭顶之灾，压抑就不能消除，爱欲就得不到解放。但在现阶段，文明不再与爱欲发生冲突，相反，文明的发展为消除压抑创造了条件：科技的发展可以把一切不悦的工作降到最低限度，甚至予以取消；物质资料的丰富可以消除匮乏的威胁。文明不必抑制人的本能，而应当允许这些本能履行自己的功能，使人尽可能获得最大的快乐和满足，这就是说，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冲突消除了，因而对爱欲的基本压抑也就没有理由存在了。然而人们面对的事实是，在现代发达工业社会里，人类的爱欲所受的压抑不仅没有消失和减轻，反而变本加厉地严重起来。很显然，这是这个社会的操作原则为维持这个特定社会的生存而对爱欲所作的额外限制。既然如此，消除这种压抑，彻底解放爱欲，就不会颠覆文明本身，而只会推翻现行社会的统治秩序。在此之后，一种没有压抑的文明就可能诞生出来。

上面的考察表明，对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阐述的爱欲解放论，不论人们作什么样的解释，都决不能与性欲放纵论混为一谈。如果象不少人所认为的那样把爱欲解放论看作六十年代末开始在美国出现的性放纵思潮的理论根据，那更是一种误解。当然，爱欲的解放也包括性欲的解放，但性欲的解放决不是性欲的放纵。因为马尔库塞虽然反对借先天伦理规范之口对人的性行为严加限制，但他也反对把人类自由等同于泛滥成灾的性放纵。因为，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论本质上是一个严肃的社会政治理论，是一个批判的文明发展理论。而且其意义可能还不限于此。马尔库塞指出，在弗洛伊德那里，主要本能，即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都属于有机体。而由于有机体一方面向下与无机物相联系，另一方面向上与精神现象相联系，本能理论就包含了对存在的一些基本看法，因而具有本体论意义。这

样,它就汇入了西方哲学的主流之中。马尔库塞指出,以黑格尔为顶峰的传统哲学一直用一种理性的逻各斯规定存在,认为最高的存在乃是奴斯,是精神。但在现代哲学中,出现了由叔本华和尼采哲学为代表的一股逆流,它有自己的逻各斯即满足的逻各斯,并用意志和快乐来规定存在。马尔库塞指出,弗洛伊德思想的深刻意义也只有置于这股逆流之中,才能被认识清楚。弗洛伊德把爱欲规定为存在的原则,把死亡本能规定为非存在原则,因此在弗洛伊德元心理学中,这两种本能的结合与传统形而上学中存在与非存在概念的结合是极其类似的。从这种观点看,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论其实也是一种寻求新的存在即本质上是快乐的存在理论,因而不仅是一种激进的社会批判理论,也是一种深刻的哲学本体论。

本书根据美国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74年版译出,同时增译了1961年标准版的一个序言。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指正。

1986年12月

## 1966 年政治序言

《爱欲与文明》这个书名表达了一种乐观的、委婉的甚至是积极的思想：发达工业社会的成就能使人扭转进步的方向，打破生产与破坏、自由与压抑之间命运攸关的联合，换言之，它能使人懂得作乐的科学，以使人在反抗死亡威胁的一贯斗争中，学会按照自己的生命本能，用社会财富来塑造自己的环境。这种乐观主义的根据是假定那些使人们长期接受统治的理论根据已经失效，匮乏和苦役这些现象也只是为了维护统治制度而被“人为地”维持着。我当初忽略或者说低估了这样一个事实：这种“行将失效”的理论根据曾被更为有效的社会控制形式（如果不是取代的话）大大强调。正是使社会得以平息生存斗争的那些力量压抑着个体寻求这样一种解放的需要。只要高标准的生活尚不足于使人们与其生命和其统治者和解，灵魂的“社会工程”和“人类关系技术”便会提供必要的力比多情感贯注。在富裕社会里，当局几乎无需证明其统治之合理。他们提供大量物品；确保臣民的性欲能量和攻击能量。与他们那样成功地代表的破坏力量也即无意识一样，他们也处于善恶之外，在他们的逻辑中，没有矛盾律的地位。

当社会的富裕日益取决于不断地生产和消费无用的垃圾货、不实用的小玩艺、故意制造的易耗品和破坏手段时，个体就决不能仅以传统的方式适应这些要求。看来，即使是最精致的经济之鞭也难以保证生存斗争能在今天已过时的社会组织中持

续下去。同样，法律和爱国精神看来也难以保证人民大众会积极支持这个制度的日益危险的扩张。因此，科学地看待人的本能需要早已成了使制度得以蕃衍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科学的态度就是把必须购买和使用的商品变成力比多的对象；把人们憎恨并与之斗争的民族敌人加以曲解、扩大成能激起并满足无意识深层的攻击性要求的对象。大众民主为这种现实原则的心力内投提供了政治装饰；它不仅允许人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选择自己的主人，参与统治自己的政府，而且还使主人们藏匿在一层由他们控制的生产和破坏设施的技术面纱背后，并掩盖了合作者在接受它的好处和舒适时所付出的人力（和物力）代价。虽然被有效操纵和组织的人是自由的，但无知、无能和内投于心的他律却是人获取这种自由的代价。

对自由人侈谈解放毫无意义，因为所谓自由人也就是不受压迫的人。同样，当男男女女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性自由时，侈谈额外压抑也是没有意义的。但事实上，这种自由和满足正在把人间变成地狱。在一些遥远的地方，如越南、刚果、南美和一些“富裕社会”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如密西西比州、亚拉巴马州和纽约的哈莱姆黑人区，就是这种人间地狱的主要部分。这些局部地区说明着总体的问题。要把这些地方说成是发达社会中的一些贫困与不幸的小角落，而且认为这个社会也有能力逐渐地、温和地清除这些小角落，这不仅是很可能，而且也是很合乎情理、甚至很实在而正确的解释。但问题在于，发达社会为清除这些角落，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难道不是美元和美分，而是人的生命和自由吗？

使用“自由”一词时，我是十分犹豫的。因为时下一些对人类犯下的罪恶恰恰打着自由的旗号。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因为贫困和剥削是经济自由的产物，全世界人民都曾一再

得到其主宰和君主施与的自由，而他们的新的自由结果表明只是对别人的法律统治（而不是一般的法律统治）的服从。这样，最初的暴力征服很快就变成了“甘受奴役”，变成了通力合作，以蕃衍一个使受奴役变得越来越有价值、越来越有意义的社会。这种同一生活方式的蕃衍规模越大、质量越高，就越是明显地、必然地表明，所有能够消除主奴关系并使压抑不再出现的其他可能的生活方式都已消失殆尽。

今天，自由和奴役的结合变得理所当然了，它已成为进步的一种手段。繁荣正越来越成为自动化生产的前提和副产品，这种自动化生产一方面正在内外层空间寻找消费和破坏的新出路，另一方面却又不愿进入国内外的贫困地区。人类的自由形象由于反对自由和攻击、生产和破坏的这种结合而被歪曲了，它成了颠覆这种进步的计划。要解放追求和平与安宁的本能需要，要解放“非社会性的”、自主的爱欲，首先就必须从压抑性的富裕中解脱出来，即必须扭转进步的方向。

我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业已提出，并在《单面人》一书中更充分地展开了一个论点，认为摆脱战争福利国家命运的唯一途径是要争取一个新的出发点，使人能在没有“内心禁欲”的前提下重建生产设施，因为这种内心禁欲为统治和剥削提供了心理基础。人的这种形象是对尼采超人的断然否定：这种人智力发达、体魄健壮，不崇尚英雄也无需具备英雄品德；这种人不想过岌岌可危的生活，不想迎接挑战；这种人心安理得地把生活作为自在的目的，快乐地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我的“多形态性欲”一词的意思是指，进步的这个新方向将完全取决于是否有可能使受压抑、被束缚的有机体的生物需要发挥积极的作用，也即使人的躯体成为享乐的工具而不是劳动的工具。老一套的做法是发展时下流行的各种需要和机能，但现在看来这已经不行了。

解放的前提或任务乃是要产生一些新的、性质完全不同的需要和机能。

这种新的现实原则的观点是基于这样一个假定：它的产生的物质(技术)前提在当代的发达工业社会里不是已经确立，就是能够确立的。不言而喻，把技术上的可能性转变成现实，这需要发动一场革命。但正是广泛而又有效的、民主的心力内投压制着历史主体，即压制着革命分子，因为自由人无需解放，而被压迫者却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解放自己。这些状况重新限定了“解放”这个乌托邦概念：它是一种最现实、最具体的历史可能性，同时又是被最合理、最有效地压抑着的，因而也是最抽象、最遥远的可能性。任何哲学、任何理论都无法阻止臣民民主地将其主人内投于心。在略微富裕的社会里，只要生产发展到了使群众能分享社会利益，使对抗能得到有效地、民主地“抑制”的程度，那么主仆之间的冲突也就得到了有效的抑制。或者说，这种冲突改变了其社会中的地位。然而在落后国家的人民起来反抗不堪忍受的殖民主义传统及其衍生物即新殖民主义时，则会出现和爆发这种冲突。马克思认为，只有那些丝毫分享不到资本主义恩惠的人才有可能把它改造成自由社会，就是说，只有那些其生存已断然否定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人才能成为解放的历史主体。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再次在国际范围内获得了普遍的有效性。一旦剥削社会成了全球势力，一旦新独立国家成了剥削社会争权夺利的战场，反抗的“外在”力量就不再是外在的了，因为它们成了制度内部的敌人。但这并没有使那些反抗者成为人类的信使。他们本身象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一样，并不代表自由。这里也可运用马克思的另一个思想：国际无产阶级能从外部获得其思想盔甲，因为思想的闪电会惊醒“单纯无邪的人民大众”。关于理论与实践统一的一些虚浮的思想没有正确看待

这种统一的脆弱开端。确实，落后国家的反叛已在发达国家中得到了响应，发达国家的年轻人正在纷纷抗议富裕社会中的压抑，反对对外战争。

一方面是对伪父亲、伪教师、伪英雄的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则是同全世界受苦人的亲如手足，在这两者之间是否有某种“有机”联系呢？这里似乎有一种差不多是本能上的亲近感。在国内，对本国的反叛似乎基本上是冲动性的，其目标很难确定，它是由“生活方式”引起的反叛，因此属于身心卫生问题。人的肉体与“机器”发生冲突，但这种机器不是可以使生活更安全、更轻松，使大自然变得更仁慈的机器，而是另一种专门取代这种机器的机器，即政治机器、社团机器和文化教育机器，它们把祸福熔成一个理性整体。今天，这个整体已有很大的规模、很强的内聚力和很有效的功能：难道否定势力还集中于那些尚未被完全征服的原始的基本力量之中？人的身体与这种机器发生着冲突，男女老少高举着最原始的武器，反抗并制止这种有史以来最残忍、最有破坏性的机器：难道当代的革命仍是一种游击战？

历史上的落后现象也有可能成为扭转进步之轮方向的历史机缘。当富裕社会的雷达轰炸机、化学武器和“特种部队”向世界上最贫困的人民及其陋室、医院和良田袭击时，过度发展的科学技术便遭到了驳斥。这些“意外的灾难”揭露了事实的真相，它们撕破了掩盖着真实威力的技术面纱。过度的烧杀能力以及与之相伴的心理行为乃是剥削和压抑制度中生产力发展的副产品。这种制度使其特等臣民越舒适，生产力就越发展。今天，富裕社会已经表明，它是一个正在交战的社会；这一点，如果其公民尚未注意到，那么其受害者必定已经注意到了。

发展缓慢的国家、技术落后的国家在历史上也可能有优越性，这就是它越过了富裕社会这个阶段。落后的民族，由于其贫



困和弱小，可能没有能力对科学技术作攻击性的、浪费性的利用，相反，它们控制好生产设施，使之只为满足和发展个体和集体的生活需要服务。

对过度发达的国家来说，这种机缘就是消除这样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人的劳动是一种自我推进的力量，它使人对生产设施的屈从以及与之相伴的过时的生存斗争方式持久存在下去。消除这些生存斗争方式一如既往地是政治活动的任务。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却存在着一个重要差别。以前的革命导致了生产力的更大规模、更为合理的发展，但今天在过度发达的社会里，革命将逆转这股潮流，它将消除过度的发展，消除其压抑的合理性。富裕生产的放弃决不意味着赞成一种纯粹的、简朴的、自然的状态，相反，它标志着(并有助于)人类发展到一个以技术社会成就为基础的更高阶段。由于不再生产那些奢侈品、有害物(这个阶段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彻底终结)，本来由这种生产给人带来的身心创伤也就可以消除了。换言之，推动人们去塑造环境、改造自然的，将是解放了的而不是压抑着的生命本能。至于攻击性，它也将服从生命本能的要求。

对落后国家来说，这种机缘则在于缺乏有助于压抑性剥削技术的条件，缺乏有助于攻击性生产的工业化。看到富裕的战争国家竟然对落后国家动用毁灭性的武器，其威胁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在落后民族的反抗下，受到富裕社会野蛮而残忍地镇压的，不仅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反叛，而且也是一种本能反叛，一种生物仇恨。在这个技术世纪的鼎盛期，游击战的蔓延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人体的能量反抗着不堪忍受的压抑，并与压抑的机器作殊死搏斗。反叛者也许对如何组织一个社会，即如何组织社会主义社会一无所知；他们也许被对此略知一二的领袖们吓得目瞪口呆，但他们可怕的生存，总需要彻底解